

全球智库半月谈

制度不确定性继续抑制信贷和经济增长

大宗商品市场的周期性

特朗普的亚洲贸易政策

美国失业率下降并未导致通胀上升

掠夺性经济与中国挑战

一个新的外债可持续指标

预期差异与货币政策的传导

本期编译

安婧宜

曹园

丁丽伟

郭子睿

侯书漪

单敬雯

史明睿

申劭婧

许平祥

伊林甸甸

杨 茜

张舜栋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家嘴研究基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首席专家	张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常殊昱	国际金融	史明睿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燕	俄罗斯政治
	任琳	全球治理	丁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联系人: 史明睿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联系人: 许怡 邮箱: naonao0619@163.com 电话: (86)21-50815287 传真: (86) 21-50815265

通讯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600 号 24 楼 2409 邮政编码: 20012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制度不确定性继续抑制信贷和经济增长 6

导读：特朗普总统的当选给美国带来了“制度不确定性”，阻碍了银行信贷、广义货币供给和总需求的增长。

大宗商品市场的周期性 9

导读：2003年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由于全球实体经济活动增加导致。本文认为亚洲市场对商品需求上升是一个稳定但短暂的现象。全球经济自2011年以来不断下滑，大宗商品价格会持续低迷。

特朗普的亚洲贸易政策 12

导读：上月，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进行了为期十二天的亚洲五国之访，主题是贸易议程中的三个方面：交易，警告和指责。亚洲之行加强了他的保护主义形象，对于担心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亚洲国家来说，以后可能会面临更糟糕的情况。

美国失业率下降并未导致通胀上升 15

导读：近期，美国的失业率下降，但通货膨胀率却一直很低，一些经济学家对此感到困惑。但实际上，菲利普斯曲线仍然适用，只是我们不应夸大其精确性。

特朗普与美国在亚洲领导权的丧失 18

导读：特朗普为期12天的亚洲访问已经宣告结束。他在访问中发表的一系列言论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作者认为，特朗普已经从根本上颠覆了持续70多年的国际秩序中多项基本准则，而这将导致美国最终丧失在亚洲的领袖地位。

超级大国的竞争：软件致胜 20

导读：目前，《财富时代》上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就美国和中国谁能成为未来世界最强势力展开各自的论述。本文以此为契机，指出两篇文章都没有提到的关键因素，即文化软实力，并对两篇文章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聚焦中国

掠夺性经济与中国挑战 23

导读：国务卿蒂勒森本月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演讲，将中国描绘为“掠夺性经济”，并呼吁美国各界有效应对来自中国的经济挑战。什么是“掠夺性经济”？美国又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作者给出了分析。

经济理论

一个新的外债可持续指标 26

导读：债务可持续性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概率概念，以当前汇率下净外债等于或小于净出口现值的概率来反映不确定性，由此构造出一个新的外债可持续指标。

预期差异与货币政策的传导 37

导读：现有理论和实证研究认为保守的货币政策会降低通胀和通胀预期。本专栏认为通胀预期的异质性会影响这一关系。结果表明，政策利率可能会在短期导致更高的通胀与通胀预期。这些研究结果也表明了央行在进行经济决策的时候需要关注通胀预测的异质性情况。

战略观察

中国在津巴布韦的影响力 41

导读：几天前，津巴布韦军方从前总统穆加贝手中接管政权。中国与津巴布韦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关系，中国与英国在津巴布韦有着一致的利益诉求，都希望津巴布韦政治和经济局势稳定，投资环境改善。

穆加贝的倒台给非洲领导人敲响了警钟 43

导读：11月21日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宣布辞职之后，非洲仍是世界上长期执政领导人最多的地区之一，目前有13个国家的领导人执政多年，而且年龄均已超过65岁。本作者认为，穆加贝的倒台意味着非洲大陆上的长期执政者将面临更大的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因为非洲人口日益年轻化，民众与本国的高龄领导人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未来几年，预计将有不同模式的权力交接在非洲不断上演。

想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把印度纳入 APEC 46

导读：11月10日，唐纳德·J·特朗普总统在越南岘港发表了讲话，描绘了其政府在亚洲的战略，其中重点强调了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本作者认为，让印度加入 APEC 所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潜在的代价，且印度之于 APEC 比 APEC 之于印度的意义更大。同时，将印度打造成民主和繁荣的亚洲中一个重要的利益攸关方的战略是可敬的，但是缺少经济的压阵，其也终将功亏一篑。

本期智库介绍 48

制度不确定性继续抑制信贷和经济增长

Steve H. Hanke /文 单敬雯/编译

导读：特朗普总统的当选给美国带来了“制度不确定性”，阻碍了银行信贷、广义货币供给和总需求的增长。编译如下：

随着特朗普总统的当选，所有观察家都认为经济会经历“特朗普冲击波”。然而，这一切却并没有发生，因为“制度不确定性”阻碍了信贷和广义货币的增长，从而影响名义经济增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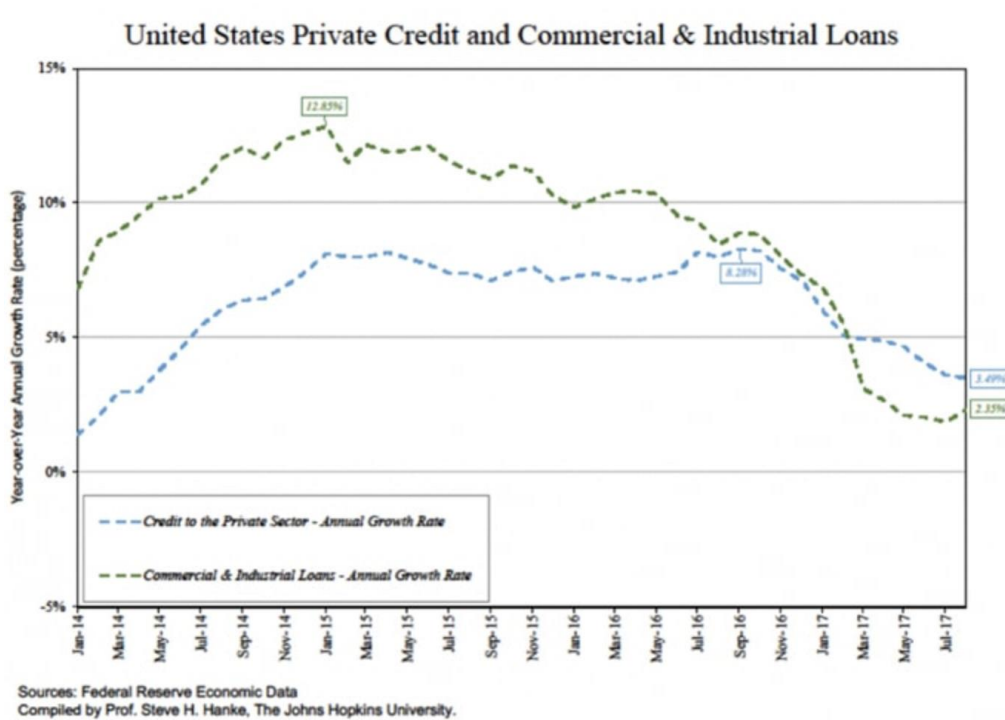
“制度不确定性”是什么？Robert Higgs 文选《萧条、战争与冷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一章题为“制度不确定性：为什么大萧条持续时间久，为什么战后经济能够恢复繁荣”，这篇文章明确了制度不确定性的概念。Higgs 认为：“制度不确定性首先涉及到财产权制度中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即私人所有者可以预期政府采取哪些行动，以影响他们对财产使用权的拥有、获得财产收益的能力和以自愿接受的条件转让给他人的能力。政府是否会接管私人财产？是否会让财产仅仅是在名义上属于私人，但剥夺私人对财产的真实控制权和收益？这些问题属于制度不确定性的范畴。”

政治家制造了“制度不确定性”。他们反复不定的政策会对自由现金流、这些现金流量的确定性和折现率产生巨大影响。因而，制度的不确定性会影响银行的贷款规模，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加，银行会收紧信贷。

Higgs 的观点在他的著作《反利维坦：政府权力与自由社会》中有很好的阐述：“罗斯福和国会采取广泛的干预主义政策，特别是在 1933 年和 1935 年的国会会议期间。新政包括新的消费支出税、补贴、法规和政府直接参与生产活动等，这些政策在商人和投资者之间造成了很多的混乱、恐惧和不确定性，导致整体上私人经济活动未能恢复到 20 世纪 20 年代的生产 and 就业水平。面对干预主义的冲击，1930 年至 1940 年间美国经济的资本存量没有增加，这 11 年间净私人投资总体减少了 31 亿美元，没有持续的资本积累，经济就无法增长。此外，政府自身经济活动的增加并不能弥补私人经济活动的缺口，因为除了花费不足之外，政府支出还存在着高比例的公款浪费。”

华盛顿特区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巨大的制度不确定性，即政策的反复不定。结果导致银行收缩贷款规模，他们的慎重正是由这种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下图展示了私人信贷和工商业贷款的年增长率，私人部门信贷总额的年增速从最近的 8.28% 高位下降到 3.49%；工商业贷款年增速则从最近的 12.85% 高位下降到了 2.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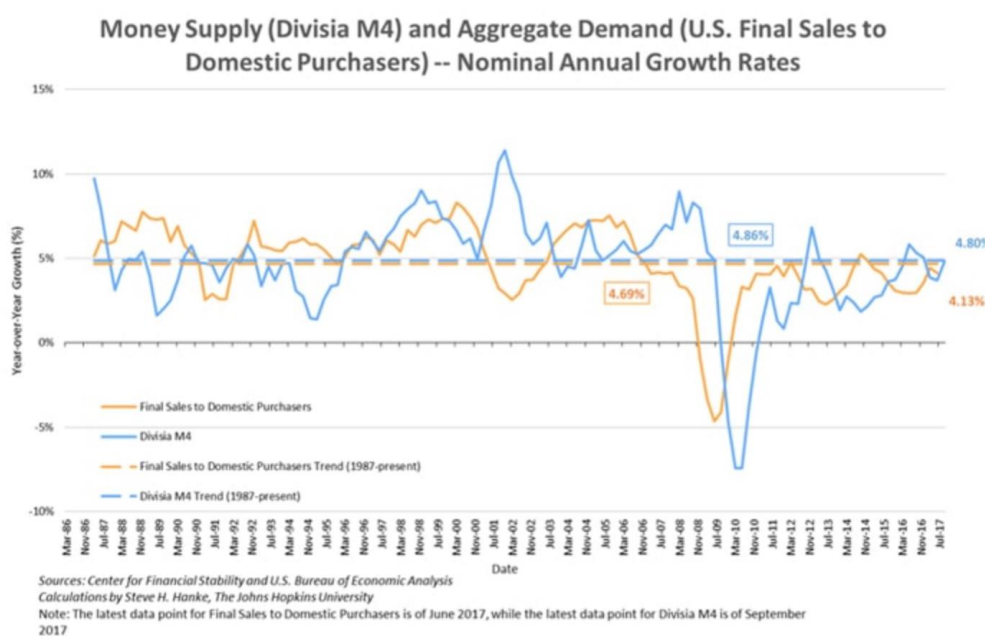
图 1 美国私人部门贷款和工商业贷款年增长率



注：横轴代表时间，纵轴代表年增长率（%），蓝色虚线代表私人部门贷款，绿色虚线代表工商业贷款。

与信贷指标相关的是广义货币供应量，这一指标正在以每年 4.80% 的速度增长，低于趋势增长率 4.86%；总需求每年正以 4.13% 的速度增长，低于趋势增长率 4.69%。由于美国正面临着制度的不确定性，“特朗普冲击波”无迹可寻。

图 2 广义货币供给和总需求的名义年增长率



注：横轴代表时间，纵轴代表年增长率（%），蓝线代表广义货币供给，黄线代表总需求。

本文原题为“Regime Uncertainty Continues to Hold down Loan Growth and the Economy”。
本文作者 Steve H. Hanke 为 CATO 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和 OMFIF 顾问委员会委员。本文于 2017 年 10 月刊于 CATO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大宗商品市场的周期性

Lutz Kilian, Xiaoqing Zhou /文 郭子睿/编译

导读：2003年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由于全球实体经济活动增加导致。本文认为亚洲市场对商品需求上升是一个稳定但短暂的现象。全球经济自2011年以来不断下滑，大宗商品价格会持续低迷。编译如下：

2003年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由于全球实体经济活动增加导致。本文认为亚洲市场对商品需求上升是一个稳定但短暂的现象。全球经济自2011年以来不断下滑，大宗商品价格会持续低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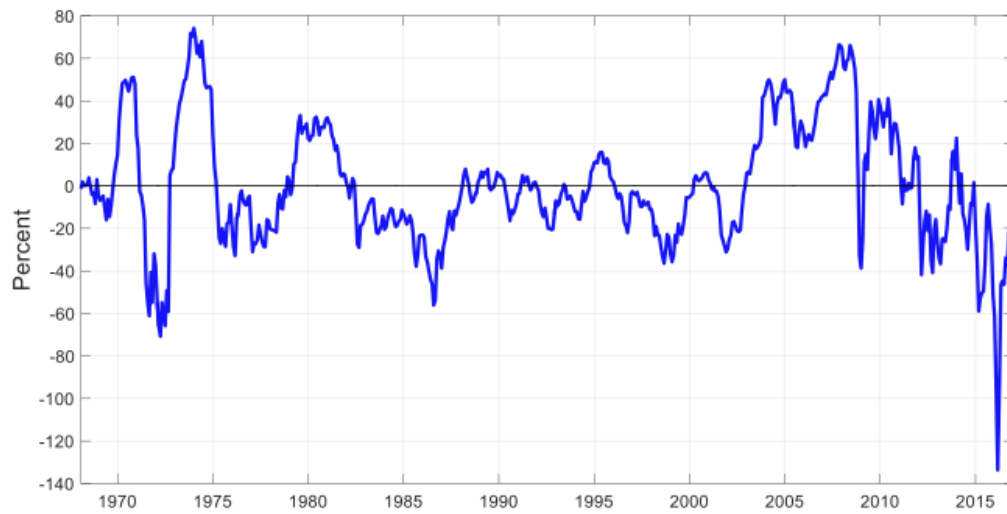
亚洲市场需求的上升是2003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尤其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的增加。有观察者认为，全球大宗商品需求达到了一个永久性的高水平，以此来应对全球经济的结构性转变。2012年来全球制造业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主要源于供给端的变化。还有一个观点认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实体经济活动一直没有完全恢复，2011年之后恢复的速度进一步下降，导致2012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为了检验哪一个观点和实际数据更加匹配，我们需要测量全球实体经济活动的周期性波动。

一系列替代指标

人们在测量全球实体经济周期方面并没有统一的指标，最常用的是Kilian提出的海运散货运载率，根据海洋运输指数作为实体经济波动的代理变量。也有一些宏观经济学家喜欢使用全球实际GDP，全球工业产出以及全球钢的产量。但我们认为Kilian指数是最适宜作为全球经济活动代理指标的。

Kilian指数的构建不依赖于国际价格和汇率的变动，该指数反应的是原材料货运量的变化，是全球工业产出的领先指标。Kilian指数覆盖范围广，频率为月度，且跨度较长。该指数显示，自2010年之后全球实体经济活动不断下滑。

Figure 1 用以表征全球实体经济活动的 Kilian (2009) 指数



此外，我们的研究显示该指标变化与石油价格变化紧密相关，但并非是由于石油是运输的成本。而是由于海运量和石油价格都受全球需求因素的驱动。这进一步增强了该指标用来衡量全球产出波动的可靠性。

全球 GDP 的缺点在于服务业在全球 GDP 中的比重越来越高，而大宗商品与工业产出的相关性更高。那使用全球工业产出呢？我们知道大宗商品在进行工业生产前需要先进口。如果我们想捕捉工业产品需求的变化，只有工业产出的波动时期是不够的，还需要它波动的幅度。

另外一种方法是观测实际商品价格指数的持续变化。原因是，实际商品价格指数波动与全球实际大宗商品市场活动成比例波动。但缺点是，对于大宗商品价格趋势模型建立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的涵盖内容是敏感的，甚至要求这些指标保持平稳。而且在一些商品的生产和管理上也会使商品价格发生变化。

我们需要知道，不同指标的选取得出的结论也不同，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应该针对不同的时期选取不同的指标进行研究。通过这三项指标的研究发现，全球经济当前回到了 2002 年开始的时候。

结论：

研究大宗商品的周期对于生产者和进出口商来说非常重要，可以通过提前得到广泛认知时预期时预测未来商品产量的变化来改变自己的行为。亚洲市场需求的增加是一个短期的现象。研究发现，未来商品价格还会持续低迷，但并不代表经济不会复苏，因为萧条和繁荣是相互更替的。大宗商品市场的供给变

化影响并没有想象的大。我们还可以从 2000 年以来全球实际经济活动繁荣中进行细致研究，发现本质的影响因素，这对于预测下一个繁荣周期非常重要。

本文原题为“[What goes up, must come down: The business cycle in global commodity markets](#)”。本文作者 Lutz Kilian 是 VOX 的研究员；Xiaoqing Zhou 是加拿大银行的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11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特朗普的亚洲贸易政策

Gary Clyde Hufbauer 和 Euijin Jung /文 杨茜/编译

导读：上月，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进行了为期十二天的亚洲五国之访，主题是贸易议程中的三个方面：交易，警告和指责。亚洲之行加强了他的保护主义形象，对于担心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亚洲国家来说，以后可能会面临更糟糕的情况。编译如下：

十一月，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进行了为期十二天的亚洲五国之访，主题是贸易议程中的三个方面：交易，警告和指责。这次亚洲之行加强了他的保护主义形象，对于那些关心其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的人来说可能是糟糕的。

1、交易

特朗普总统非常满意在访问期间达成的交易。他于 2017 年 5 月到沙特阿拉伯进行首次国外访问，沙特承诺购买 1100 亿美元的美国军事装备。亚洲之行也始于同样的意图，特朗普敦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购买更多的军事设备，但日本首席内阁秘书谨慎地申明，政府将坚持现有的军事计划，不会购买新的武器。日本汽车零部件生产商 Denso 公司宣布将投资 10 亿美元改造其位于美国田纳西州的工厂。

在特朗普访问韩国期间，韩国企业宣布，他们打算在未来四年内启动价值 173 亿美元的美国投资项目，以及采购包括天然气在内价值 5750 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

在访问中国期间，特朗普宣布美国和中国公司达成了 2500 亿美元的商业交易。中国能源投资集团宣布，计划在西弗吉尼亚州投资 837 亿美元用于天然气液体和衍生物的发电、化学制造和地下储存。中石化与阿拉斯加达成协议，共同开发液化天然气项目，这一项目所涉及的投资高达 430 亿美元。波音公司获得了 300 架飞机，价值 360 亿美元的订单，高通向三家中国公司出售价值 120 亿美元的半导体

特朗普亚洲之行达成的交易扭转了对双边贸易赤字的关注——这是评判贸易协定的错误度量方法。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谈到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超过 3000 亿美元，“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情况还是较片面的”，并指出“真正解决这种情况，我们还得找出背后的因素。”

2、警告

2016 年日本与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 690 亿美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得到了美国的警告。此外，日本官员歪曲了特朗普寻求双边贸易协定的要求，而将其外交筹码置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协议上——美国不参加所谓的 TPP 11。

韩国总统文在寅并不那么幸运。特朗普把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称为“不成功，对美国不友好的”，并要求韩国加快修正。他认为美国对南韩的贸易逆差可以通过增加韩国对美国军事装备的采购来减少。

在特朗普亚洲之行之前，文在寅准备让美国退出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在朝鲜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后，这一举措被搁置。

但无论是美国还是韩国，终止韩美自由贸易的可能性仍存在。韩国贸易部长金铉宗预先要求国会批准终止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如果美国的要求太极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特朗普相处融洽。但是，在中国访问期间，特朗普曾经不同的场合抱怨美国与世界的贸易赤字达 5000 亿美元，把与中国的贸易赤字归因于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扩大了美国的进口，以及中国的贸易壁垒限制了美国出口。

特朗普讽刺地称赞中国谈判代表打败了美国代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试图软化特朗普的言论：“这是开玩笑的，但其中也有很多事实。”

3、指责

特朗普参加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告诉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美国不再是一个狂热的国家：“美国不再愿意接受过去那种多边贸易协定，我们将不再签订那些束缚手脚、被迫放弃主权、真正的强制执行几乎不可能的协定。”

TPP 的另外 11 名成员国在听到这些话后，宣布他们有意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批准该协议。

此外，特朗普还对他的前任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我不怪中国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利用美国的国家。我曾经希望我国先前的政府看到事情的发生并采取行动。但他们并没有，现在我会采取措施，今后我们要在公平和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竞争，不会再让美国被利用了。”

特朗普还间接称赞了欧洲、日本、墨西哥、韩国和中国上一代的贸易部长。

对于担心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亚洲国家来说，以后可能会面临更糟糕的情况。

本文原题为“Trump's trade agenda in Asia: it could have been worse”。本文作者 Gary Clyde Hufbauer 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雷金纳德·琼斯中心的高级研究员，Euijin Jung 为 Euijin Jung 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分析师。本文于 2017 年 11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美国失业率下降并未导致通胀上升

Joseph E. Gagnon /文 侯书漪/编译

导读：近期，美国的失业率下降，但通货膨胀率却一直很低，一些经济学家对此感到困惑。但实际上，菲利普斯曲线仍然适用，只是我们不应夸大其精确性。编译如下：

近期，美国的经济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潜在就业水平，但通货膨胀率却一直很低，一些经济学家对此感到困惑。评论者认为，中央银行不应将菲利普斯曲线模型过于信任，菲利普斯曲线是通货膨胀对于潜在就业的偏离的反应，但是他们得出的政策结论却是截然相反的：有人说美联储不需要收紧货币政策，但也有人认为美联储应该更快地收紧货币政策。

然而，通货膨胀的变化正如菲利普斯曲线所预测的那样。美国失业率的下降是最近的事情，而且降幅很小，不足以导致目前的通胀率显著上升。明年，通货膨胀可能会相应上升，而这也支持了美联储紧缩的道路，尽管仍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从简单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来看，真正令人困惑的是，当2010-2014年的经济远低于潜在就业水平时，通货膨胀率却并没有大幅下降。但是，这个困惑很容易由以下事实来解释：工人和企业强烈抵制工资和价格的彻底下降。研究表明，当总体通货膨胀率显著高于零时，个别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化在平均通货膨胀率附近形成一个典型的钟形曲线形状。但当整体通胀接近于零时，由于企业非常不愿意降价，钟形曲线就扭曲了。即使经济十分萧条，也不能诱使许多企业降低价格和工资。

工资下降和价格刚性对菲利普斯曲线的影响如下图所示。纵轴表示美国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横轴表示实际就业和潜在就业之间的差距占劳动力的百分比。左图侧重于通货膨胀率低于3%的季度，右侧区域则侧重通货膨胀率在3%以上的季度。

图 1：低通胀和高通胀时的菲利普斯曲线，1963Q1-2017Q3



注：通货膨胀的变化是个人消费支出（不包括食品和能源）指数价格在第四季度的百分比变化减去前三年的平均百分比变化。就业缺口是国会预算办公室对自然失业率的估计减去实际失业率。就业缺口存在四个季度的滞后。左右两图之间的差别是基于一年前的第四季度的通货膨胀。

来源：哈佛数据和作者的计算

右图显示了菲利普斯曲线的正相关关系。当经济超出潜在就业水平时，通货膨胀上升，当经济低于潜在就业水平时，通货膨胀下降。在左图中，当经济高于潜在就业水平时，有部分证据表明两者存在正相关关系，但能被观察到的点相对较少。显而易见的是，当经济低于潜在就业时，正的斜率就消失了，正如下降的工资和价格刚性所暗示的那样。通过其他可以用来衡量通货膨胀和经济疲软的指标，以及当通货膨胀的变化是相对于以前的调查预期而非之后的通胀来衡量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出类似的结果。

从历史上来看，2017 年中期出现的通货膨胀的意外下降也并不是特别大。该图显示了最新的观察（2017Q3）的位置，这在历史菲利普斯曲线经验之内。2017 年 2 月，失业率就等于估计的自然失业率 4.7%。2017 年 10 月，失业率

下降到了 4.1%，这意味着整体就业率比潜在就业率高出 0.6 个百分点。根据菲利普斯曲线，我们预计通货膨胀在明年会上涨大约 0.5 个百分点。但是历史经验表明，通胀率最终可能会处于我们的预测下浮 1 个百分点和上浮 3 个百分点的区间。换句话说，菲利普斯曲线仍然是通货膨胀重要的根本驱动力，但是我们不应该夸大其精确性。

本文原题为“[There is no inflation puzzle](#)”。本文作者是 Joseph E. Gagnon，他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自 2009 年以来成为 PIIE 的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11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特朗普与美国在亚洲领导权的丧失

David A. Welch / 文 张舜栋 / 编译

导读：特朗普为期 12 天的亚洲访问已经宣告结束。他在访问中发表的一系列言论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作者认为，特朗普已经从根本上颠覆了持续 70 多年的国际秩序中多项基本准则，而这将导致美国最终丧失在亚洲的领袖地位。全文如下：

特朗普总统刚刚结束了为期 12 天的亚洲之行。如今，是时候让我们好好评估一下此次访问的得与失了。

从好的一面来讲，特朗普的此次访问至少从两个方面来讲是大获成功的：一是他没有闹出什么大的乱子；二是他大体上遵循了常规，没有做出，或者说至少是没有做出太多出格的举动。尽管大家并不认为特朗普真的会搞出太大的麻烦，但是观察家们此前确实普遍担忧特朗普访问期间会发表什么激化朝鲜挑衅的言论。要知道，特朗普在韩国期间朝鲜极有可能做出某种挑衅行为，因为朝鲜知道美国不会在总统访韩期间立即发动报复。同时，考虑到朝鲜历来喜欢抢北京的风头，特朗普在访华期间朝鲜发起挑衅的概率也会显著提高。令人欣慰的是，朝鲜并没有做出什么特别的举动，仅仅是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声明。相比于近几年朝鲜当局的行事风格，仅仅发表声明算得上是相当温和的举动。

在特朗普本人看来，这无疑是一次成功的访问。特朗普反复宣称自己与中国签署了 2500 亿美元的合同，并且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热情招待”。不过，根据白宫事先的宣传，特朗普此次访华主要有两大目的：一是促使中国向朝鲜施加更大压力；二是与中国达成更为公平的贸易协定。显然，特朗普并没有完成这两项任务当中的任何一个——中国既没有针对朝鲜发表任何新的声明，也没有与美国达成什么贸易协定。

不幸的是，事实证明，特朗普在经验丰富的中国当局面前被彻底戏耍了。他被中国虚情假意的奉承冲昏了头脑，甚至忘掉了自己此行最大的目的。此外，特朗普的此次访问还充斥着各种令人尴尬的细节，诸如：

- 在离开火奴鲁鲁前往日本前，特朗普发推表示：“铭记珍珠港”；
- 在日本期间，特朗普刻意回避了参观广岛纪念馆的行程，并且在不当的场合将日本称为“武士之国”；
- 在中国，特朗普热情地称赞了中国在经济事务上的种种表现，全然不顾这是建立在对美国不公平的贸易基础上的；
- 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特朗普坚称自己相信普京“没有干涉美国大选”的承诺。当被记者指出这与特朗普自己的情报官员的言论相左时，特朗普尴尬地表示自己既相信普京，也相信自己的情报系统；

•在河内，特朗普轻松地表示自己愿意针对南海问题发挥调停和仲裁的作用。殊不知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绝不会接受任何人的调停和仲裁，更不要说是美国总统了；

抛开这些尴尬的场景不谈，特朗普此次亚洲之行的主题还是非常鲜明的，那就是“美国至上”。这实质上意味着，特朗普已经在朝核问题上放弃了多边解决的努力。此外，在贸易问题上特朗普也坚称“美国绝不会加入任何自缚手脚、丧权辱国的贸易协定。”事实上，特朗普已经从根本上颠覆了持续 70 多年的国际秩序中多项基本准则。这包括：贸易上包容的多边主义，以及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与相关利益国携手合作的传统。这意味着，美国将再难以发挥地区安全与稳定问题上的领袖作用。

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带领美国在国际舞台上退缩的潜在后果。美国的盟国和伙伴们将不再敢于相信和依靠美国，这将为中国的扩张大开方便之门。在这种局面下，唯一的赢家将会是中国。中国近年来反复宣称自己是国际经贸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如今，特朗普的言论将更令中国确信，自己的扩张不会受到美国的阻挠。我们非常肯定，在未来的亚洲问题上，美国势必遭遇来自中国更为严峻的挑战。

本文原题为“Trump and the death of American leadership in Asia”。本文作者 David A. Welch 是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资深研究员，滑铁卢大学政治学教授。原文于 2017 年 11 月 15 日发表在 CIG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超级大国的竞争：软件致胜

Denny Roy /文 申劭婧/编译

导读：目前，《财富时代》上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就美国和中国谁能成为未来世界最强势力展开各自的论述。本文以此为契机，指出两篇文章都没有提到的关键因素，即文化软实力，并对两篇文章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编译如下：

在 11 月 2 日刊登在《财富时代》的文章中，美国著名政治家乔瑟夫奈称在于中国的超级大国竞争中，美国有四方面的长期优势。11 月 7 日，《财富时代》刊登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高级学者王文（音译）对此篇文章的反驳。这样的交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即全球领导权从不断收紧势力的美国向崛起的中国的转移。这种交锋也寓意丰富，但两位作者没有提到，至少没有直接说出来。讽刺的是，他们没有说出来的内容可能包含了中美在全球影响力竞争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

奈提到的美国其中两个优势是有形的：美国的地理环境（东西都临海，南北没有有威胁性的邻居）及因其丰富的自然禀赋而带来的潜在能源独立能力。与此相比，中国周围邻居都虎视眈眈，甚至与其中一些国家在过去一个世纪以后仍有军事冲突。而且目前中国依赖于不断增长的能源进口，大部分都是通过有世界上最强海军巡逻的国际公海运输。

奈提出的其他两个优势来自于美国经济的规模和生产力：美国较少依赖于国际贸易，且美元是国际主要储藏货币。中国对外贸的需求相对较高，且人民币虽然有挑战美元的地位，但程度尚微。

在反驳文章中，王文从明显荒谬的美国地理缓冲论谈起。他说这根本不算一个优势，因为独来独往的恐怖分子能够给予遥远的地方沉重打击，这要远远超过传统地缘政治的敌意。可以这么说，个人狂热分子偶尔发动街面袭击不是毁灭民族国家的威胁，但是传统的大国战争是。

王文没有反驳中国高度依赖能源进口，但是他试图从积极方面给予解读，“中国以开放的姿态欢迎中东，俄罗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能源市场”。不过，石油出口国欢迎大客户无疑是显而易见的。

对奈的外贸依赖观点，王文也给出了解释“尽管美国可能在贸易战争中表现更好，中国却能在全球自由贸易的引领潮流”。似乎他的意思是中国的弱点可以被其做正确的事所消除。然而中国对自由贸易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单向的。比如美国汽车在中国销售要被收取 25% 的关税，而在美销售的中国汽车只有 2.5%。而且不像在中国的美国的企业那样，在美中国企业无需与当地公司合作，交出技术专利和数字安保数据。

由此开始，王文的反驳变成了没有丝毫批判性，只是给中国共产党不断的呐喊助威的文字。中国有“商业敏锐度”，“自信不断提高”，现在已经“塑造了未来中美关系的前景”，而美国是“故意搞破坏”。王文说中国因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提议，对气候变化所做的贡献，对自由贸易的“捍卫”，“重塑国际新秩序”及“对联合国的有力支持”而广受尊敬。而美国的国际声望在其“退出国际事务”和衰落的“软实力”打击下不断降低。即使是“如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和英国等美国传统合作伙伴也对中国和习近平主席给予了高度评价”。因此，他预言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理念将胜过美国对中美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促进双赢合作”的理念。最终，这意味着美国对有利于中国的结构性非对称贸易和投资关系的默许以及其从亚洲战略影响的消退。目前，这个结果只是中国美好的愿景，尽管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促进了这一局面的产生。

在中美两国在全球地位上升的问题上，王文并没有提到真正关键的因素。关键区别不在于硬件——领土广大，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经济体有力且多样——，而是在于软件：即政治体制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目前美国的联邦政府好像无力处理大型且有组织的国内问题。州和市政府可以维持公正正义，经济发展和公共健康安全有保障的局面，但是国家层面上低效的政府将对整个社会的福利都是妨碍，并最终影响其国际影响力和软实力。王文提到，内部政治斗争是西方自由主义失败的一个证据。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这其实是社会抒发不满，敦促政府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美国媒体公开报道的关于种族不平等，性骚扰等问题使得一些中国官员沾沾自喜。然而许多中国人民的反应却是“我们也有这些问题，只不过不公开讨论而已”。

习近平在预期的五年甚至更长的任期内，必须领导中国走过经济重构的艰难时刻，应对中国社会新贵不断增长的期待，解决弱势群体的不满，并在保证不刺激针对中国结盟的前提下推进其外交政策。通过提高共产党在政治，经济事务上的控制力，习近平试图通过一种从故纸堆中挖出的政治模式来实现上述的全部目标。

中国的政治体制催生了粗犷的中央政府行动。此举当然不无好处，但是缺点也很明显。正如许多观察家指出的那样，习近平的治国方法是毛泽东将权力收归中央，搞个人崇拜的余灰，要求下属对领导不加疑问的忠诚。这一体制曾在中国导致了许多严重的问题。

本文并非针对王文，但是他的文章论证并不像奈那样运用逻辑和事实，而更像是给本国的上级展现出一种反驳美国高傲的姿态。王文说，“与西方社会自相残杀的斗争相比，中国不断增长的维持有序管理的能力是正在发展的世界

的希望灯塔”。这是对一个古老问题的再一次重复，即自由的政治体制到底是像美国认为的那样能促进经济发展，还是像中国共产党相信的会造成社会不稳定，阻挠经济的发展。尽管各自都面临着内部问题，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和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间的竞赛，将对两个政治体制是否有效进行检验。

本文原题为“In the superpower competition, the best software will win”。本文作者 Denny Roy 是火奴鲁鲁东西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11 月刊于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掠夺性经济与中国挑战

Matthew P. Goodman / 文 伊林甸甸 / 编译

导读：国务卿蒂勒森本月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演讲，将中国描绘为“掠夺性经济”，并呼吁美国各界有效应对来自中国的经济挑战。什么是“掠夺性经济”？美国又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作者给出了分析。全文如下：

“我们必须与印度携手努力，确保从印度到太平洋的广阔区域不沦为一个秩序混乱、冲突不断的，充斥着掠夺性经济的地区。”这番言论是国务卿蒂勒森在今年 10 月 18 日于 CSIS 主办的美印关系高峰论坛上发表的主旨演讲的核心内容。这番言论的最后一个提法：“掠夺性经济”，无疑是含沙射影地指代中国，因此这也引起了各方的广泛关注。应该说，这个提法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事实，但是这也有可能使得区域内的其他国家产生不好的联想。因此，美国当局有必要在适当场合就这一提法进行更为积极、具体的解读。

之所以说蒂勒森的提法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不假，是因为中国的贸易与投资行为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存在问题的，在 2012 年以来则更是如此。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正在采取越来越多的经贸手段，来达成其外交及政治目的。举例来说，在美国于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后，中国大幅限制了与韩国的贸易与人员往来；而在菲律宾政府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提出诉讼后，中国旋即对其向中国出口的香蕉施行了禁运。

与此同时，中国的贸易伙伴国也与中国在各种问题上摩擦不断。这些争端包括中国对其他国家广泛的市场准入限制、针对外资利用的过度监管、普遍存在的补贴和倾销行为，以及对知识产权的多种侵犯。此外，美国的商务与国家安全专家们也普遍认为，中国的这些行为在未来并不会有所改变。中国提出的“中国制造 2025”计划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中国意图在未来的多个关键行业占据世界领先地位，这些行业的突出典型包括：机器人制造、航空航天，以及生物科技。

国务卿蒂勒森在演讲结束后的问答环节提到了有关“掠夺性经济”更详细的解释。他举了金融援助的例子，表示有些国家倾向于向目标国提供低质量的贷款，从而在日后要挟目标国以损害其国家利益的方式进行交换。蒂勒森表示美国正在与相关国家商讨提供其他方式的金融援助。特朗普总统在越南岘港发表的演讲中也呼应了蒂勒森的此番表态，总统呼吁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向域内国家提供更高质量的投资，总统也希望美国的海外私人投资集团（OPIC）向亚洲国家提供能够替代中国资本的外资选项。

应该说这些举措都是有建设性的，不过特朗普政府也应该更加谨慎，尤其是不能把一切中国的投资都称作是“掠夺性”的。中国近年来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

在区域内引起了热烈反响，如果特朗普政府继续延续奥巴马时代的政策，一味拉帮结派，跟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问题上唱反调，很可能会再一次遭到奥巴马政府反对亚投行时的失败。

诚然，美国在看到中国违反、甚至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经济秩序时，应该劝其悬崖勒马；在看到其利用经贸手段压迫周边邻国时也应该加以制止。但是，所有这些举措都必须以不破坏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为前提。客观地讲，从维护现有秩序的角度来讲，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言论反而是更加令人担忧。

另外，中国系统性地通过各种手段从美国及其盟友处获取高精尖技术的行为，也往往被描绘为“掠夺性经济”的表现之一。当然，无论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还是从保持美国在多个领域的行业竞争优势的角度来看，这种担忧完全是无可厚非的。美国应当确保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拥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防止来自中国的投资损害美国的安全利益。

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些问题上不能仅局限于被动防守，更要学会主动出击。我们能做的有两条：一是我们必须延续过去几十年内的做法，提出一套系统的经济方案，从而进一步推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复苏和市场开放。蒂勒森和特朗普总统在最近的讲话中都提到了这一点。然而，特朗普总统在这个问题上却抛弃了我们手头最为有力的政策工具——TPP。相反，特朗普总统不仅不试图建立任何有号召力的区域多边贸易协定，反而不断地指责美国的各个贸易伙伴通过不公平的贸易手段损害了美国利益，这其中还不乏美国的重要盟友和传统伙伴。此外，美国还不断在区域内兜售不公平的双边贸易谈判方案，毫无疑问，任何一个理智的亚洲国家都不可能接受这种单方面有利于美国的协定。

此外，另一项我们当前需要着手展开的重要工作，则是增强对美国自身的投资。如果美国不投资改善国内日益老化的基础设施，不改革教育系统以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不进一步推进科学与产业研究的创新，我们又如何跟在这些领域做出扎实努力的中国展开竞争呢？尽管我们的专业是国际关系，但我们认为美国在这些领域的优势是其长久保持国际领导地位的基础，因此我们对这些问题同样拥有话语权。

以上，我们提出了美国妥善应对中国挑战的四条线索——约束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保护我们的高端科技、推进全球的经济复苏、加强对美国国内的投资，而这其中任何一件事的成功都有赖于我们与盟国的密切合作。显然，美国并没有能力独立阻止中国崛起——我们需要盟友配合利用WTO平台对中国提起诉讼、需要盟友提供关于中国技术引进的信息、需要盟友配合重建健全的多边贸易体系，甚至需要盟友协助投资美国国内的基础设施。

在 1967 年，法国学者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Jean-Jacques Servan-Schreiber)曾写过一本带有预言意味的著作：《美国的挑战》。在这本书中，他警告欧洲各国政府警惕无处不在的美国渗透。他认为，美国的经济和文化渗透将最终威胁欧洲国家的地位。不过，施赖贝尔并没有简单地指责美国是一种“掠夺性的经济”。相反，他鼓励欧洲各国携起手来，向美国积极学习，应对挑战。或许，这个建议在我们面临“中国的挑战”时依然有效。此外，正如特朗普总统所言，我们时刻应该谨记“美国至上”的原则，在保持美国的全球竞争力的前提下，团结我们的盟国，从而维护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并且妥善地应对中国的挑战。

本文原题为“Predatory economics and the China challenge”。本文作者 Matthew P. Goodman 是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资深研究员，政治经济学与亚洲问题专家。原文于 2017 年 11 月 21 日发表在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一个新的外债可持续指标

Olivier Blanchard 和 Mitali Das/文 许平祥/编译

导读：债务可持续性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概率概念，以当前汇率下净外债等于或小于净出口现值的概率来反映不确定性，由此构造出一个新的外债可持续指标。编译如下：

如果借款人能够及时还款，我们就认为债务是可持续的。对于一个国家的外部债务而言，如果当前的净外债小于或等于净出口现值，那么外部债务就是可持续的。然而这种理解有两点不足：其一，净出口现值是一个随机变量；其二，净出口以及净外债的值与汇率有关。

因此，外债可持续指标重新定义为：在当前汇率下，如果净外债等于或小于净出口现值的概率极高，那么外债就是可持续的。我们的目标是构造一个以概率定义的可持续指标，需要以下三个步骤来完成：

- (1) 获取当前汇率下净出口现值的分布
- (2) 获取净出口现值至少等于当前净外债值的汇率分布
- (3) 根据当前汇率在汇率分布中的位置来评估债务可持续的概率

构建这样一种可持续指标，需要解决若干概念上和实证上的问题。我们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历史和预测的贸易数据，例如利用 IMF 国家部门的各国外债评估数据，来构造这一指标。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为在确定性和资产与负债收益率相同假定下的基本推导；第二部分为讨论第一种复杂情况：考虑相关折现系数有时大于 1 的情况；第三部分为讨论第二种复杂情况：考虑资产和负债收益率不同的情况；第四部分为讨论如何引入净出口和收益率的不确定性；第五部分为在美国的应用；第六部分为在智利的应用；第七部分为结论。

1、基本推导

假定外债累积由下式给出：

$$D_{t+1} = (1 + r_t)D_t - NX_t \quad (1)$$

其中 D_t 是 t 期开始时的净债务， NX_t 是 t 期的净出口， r_t 是从 t 到 $t+1$ 的实际利率。

递归求解给出：

$$D_t = \sum_{j=0}^n \left(\prod_{i=0}^j (1 + r_{t+i})^{-1} \right) NX_{t+j} + \left(\prod_{i=0}^n (1 + r_{t+i})^{-1} \right) D_{t+n+1} \quad (2)$$

或者就 GDP 的比率而言：

$$d_t = \sum_{j=0}^n \prod_{i=0}^j \frac{1 + g_{t+i}}{1 + r_{t+i}} nx_{t+j} + \prod_{i=0}^n \frac{1 + g_{t+i}}{1 + r_{t+i}} d_{t+n+1} \quad (3)$$

其中 d 表示外债与 GDP 的比值, nx 表示净出口与 GDP 的比值, g 表示 GDP 的增长率。在债务与 GDP 的比率非增的条件下, 最后一项必须是非正的, 因为 n 倾向于 ∞ , 因此:

$$d_t \leq \sum_{j=0}^{\infty} \prod_{i=0}^j \frac{1 + g_{t+i}}{1 + r_{t+i}} nx_{t+j} \quad (4)$$

可持续性要求净外债与 GDP 的比率等于或小于净出口现值与 GDP 的比率。根据当前水平的汇率和未来的 r 和 g 值, 一定能求出 nx 的未来价值。那么, 可持续性就能很容易计算出来。然而在不确定的情况下, 我们必须计算出每一潜在的可实现持续性的汇率值, 来获得汇率分布。

2、折现系数

计算净出口现值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折现系数 $(1 + g)/(1 + r)$ 的选择问题。我们利用 24 个国家不同时期年增长的历史平均值和债务回报率计算出了一个介于 0.96 和 1.96 之间的折现系数, 其中有 3 个国家的折现系数等于或大于 1 (见附录 1)。相反, 利用资产回报率得出一个介于 0.96 和 1.09 之间的折现系数, 其中有 9 个国家的折现系数等于或大于 1。

折现系数大于 1 意味着债务自动地可持续。然而折现系数总是大于 1 是不太可能的, 因此可持续性仍然是一个潜在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即便折现系数小于 1, 它也是接近于 1 的。

想要知道满足未来债务等于或小于当前债务的汇率值, 就等式 3 而言, 强加一个条件 $d_{t+n+1} = d_t$, 因此条件变成:

$$d_t \left(1 - \prod_{i=0}^n \frac{1 + g_{t+i}}{1 + r_{t+i}} \right) \leq \sum_{j=0}^n \prod_{i=0}^j \frac{1 + g_{t+i}}{1 + r_{t+i}} nx_{t+j} \quad (5)$$

请注意，如果 nx , g , r 在未来是不变的，那么满足方程 (5) 和方程 (3) 的汇率就是相同的，否则随着时间的变化二者将是不同的，并且改进后的指数伴随着一个更小的汇率分布。

n 应该是多少？理想的情况是它和我们预估的一样高。WE0 提供了长达五年的预测。到那时，很多净出口的周期性运动可能会消失。令 $n=5$ ，这是我们以后要做的。

3、不同的资产和负债回报率

以上的研究都是基于资产和负债回报率相同的假设，但是事实上，二者经常是不同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债务利率低于资产回报率，因此当存在贸易赤字时，能够限制债务的增长。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情况与之正好相反（见附录 1）。

把资产和负债回报率不同考虑进去，让 A 和 L 分别代表总资产和总负债，因此净债务为 $D=A-L$ 。让 r_A 和 r_L 分别代表总资产和总负债的收益率。债务动态公式如下：

$$L_{t+1} - A_{t+1} = (1 + r_L)L_t - (1 + r_A)A_t - NX_t \quad (6)$$

可以改写为：

$$L_{t+1} - A_{t+1} = (1 + r_L)(L_t - A_t) - (r_A - r_L)A_t - NX_t \quad (7)$$

或等同：

$$D_{t+1} = (1 + r_L)D_t - [NX_t + (r_A - r_L)A_t] \quad (8)$$

括号内的相关流量等于净出口加上利率差异乘以总资产头寸。按国内生产总值划分，如前所述，并施加非增条件得出以下不等式：

$$d_t \leq \sum_{j=0}^{\infty} \prod_{i=0}^j \frac{1 + g_{t+i}}{1 + r_{L_{t+i}}} [nx_{t+j} + (r_{A_{t+j}} - r_{L_{t+j}})a_{t+j}] \quad (9)$$

可持续性要求净债务占GDP的比例等于或小于净出口占GDP的比例的现值加上利息差异乘以总资产与GDP的比率。如果我们应用与前一节相同的部分，那么不等式变成：

$$d_t \left(1 - \prod_{i=0}^n \frac{1+g_{t+i}}{1+r_{Lt+i}}\right) \leq \sum_{j=0}^n \prod_{i=0}^j \frac{1+g_{t+i}}{1+r_{Lt+i}} [(nx_{t+j} + (r_{At+j} - r_{Lt+j})a_{t+j}] \quad (10)$$

如果右边的变量都是已知的，那么指标的计算就会很容易；唯一的变化就是需要知道总资产与GDP的比值，这一比率不受债务动态的条件制约。但是变量的价值是不确定的，这带我们到下一节，引入不确定性。

4、不确定性

无论是未来的净出口、增长，还是资产和负债的收益率都是不确定的。为了从历史数据中获得高阶矩的分布，我们提出以下方法：

定义向量 $X = [nx, g, rL, rA, a]$ ，运用下面的VAR：

$$\begin{bmatrix} X \\ e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A_{11}(L) & A_{12}(L) \\ A_{21}(L) & A_{22}(L) \end{bmatrix} \times \begin{bmatrix} X(-1) \\ e(-1)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epsilon_X \\ \epsilon_e \end{bmatrix}$$

当VAR给出包括汇率在内的所有变量的联合变动时，构建方程(10)两边所需的预测指的是假定汇率恒定的X变量的联合变动。这些可以通过子系统来实现：

$$X = A_{11}(L)X(-1) + \epsilon_X$$

变量X的联合分布以及等式(10)两边的联合分布可以通过随机模拟得到。在应用之前，我们要注意指数与其他两个衡量外债可持续性的指标之间的关系。

其一，这种被IMF使用的方法是CGER实践的一部分，它与我们构造的指数在四个方面有所不同。首先是要求今后某个时候的债务等于今天的债务，而我们的假设是，今天折现的债务等于今天的债务；当贴现因子接近于1时，实际上这个差异在数量上是比较小的。二是明确处理收益率的差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中通常不考虑这一点，只有几个国家除外。三是汇率的调整同时影响方程(10)的左右两边；然而，CGER并未考虑债务重估问题。第四是最重要的，即对不确定性的明确处理：债务很难持续，或者确定无法持续。我们的可持续性指数给出了关于外债状况和汇率调整的更多信息。

第二个是马丁·埃文斯 (Martin Evans) 提出的指数 (Evans, 2012)，它仔细考虑了回报率差异，但是使用了不同的近似值来得到方程 (10) 的对数线性近似值。并且，主要区别在于我们考虑了未来收益，净出口和增长的不确定性。

5、美国的应用

现在将我们的方法首先应用于美国和智利。

表 1 给出了 WEO 以 2017 年为起点至 2022 年的预测以及 2016 年底的资产和负债头寸。

表 1 美国数据及预测，2016-2022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净债务/GDP	44%	44%	46%	47%	49%	51%	52%
资产/GDP	129%	142%	148%	153%	158%	162%	165%
负债/GDP	172%	186%	194%	200%	207%	213%	217%
净出口/GDP		-3.8%	-4.1%	-4.4%	-4.4%	-4.2%	-4.2%
实际 GDP 增长		2.3%	2.5%	2.1%	1.8%	1.7%	1.7%
实际资产收益率		3.6%	3.0%	2.9%	2.7%	2.7%	2.7%
实际负债收益率		2.0%	1.9%	1.8%	1.7%	1.6%	1.6%

窗体顶端

假设这些预测是确定的。等式 (10) 中两项可以通过计算得到。净出口现值加上收益率差异乘以资产的折现值(在下文中,我们称之为“现值”)等于-14.5%。净债务的相应数值乘以 1 减去相关贴现因子(我们简称为“调整后的净债务”)等于-0.6%。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的净债务是正的,但实际上却是负的,因为相关的贴现因子稍高于 1。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债务在当前汇率下是不可持续的。

下一步将计算使其可持续的汇率。汇率同时影响等式 (10) 的两边,从左边开始,计算汇率对净债务的影响,需要知道以外币表示的总资产和负债的比例。

2012年,美国资产的68%左右以外币计价,而美国负债中只有16%以外币计价。假设这些比例在2016年底基本保持不变,用表1中的资产负债率与GDP的比值表示,实际贬值10%减少净债务占GDP的7%。

再来看等式的右边。利用IMF外部资产评估的净出口对实际汇率的半弹性,实际贬值10%增加净出口占GDP的7%。

综合考虑等式两边,在预测是确定的假定下,债务可持续性要求实际汇率贬值9.2%左右。

对于收益率 r_A 和 r_L ,我们可以考虑两种方法。其一,考虑由于资产价格变化引起的资本收益或损失但不考虑汇率因素的影响。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资产和负债的收益率等于名义回报率减去CPI通胀率。其二,对于美国而言,真实的收益需要加上已实现的由于本国货币资产价格改变带来的资本收益或损失。如图1所示,美国资产和负债的资本收益变动率远远超过收益率,导致下面模拟结果的分布更为广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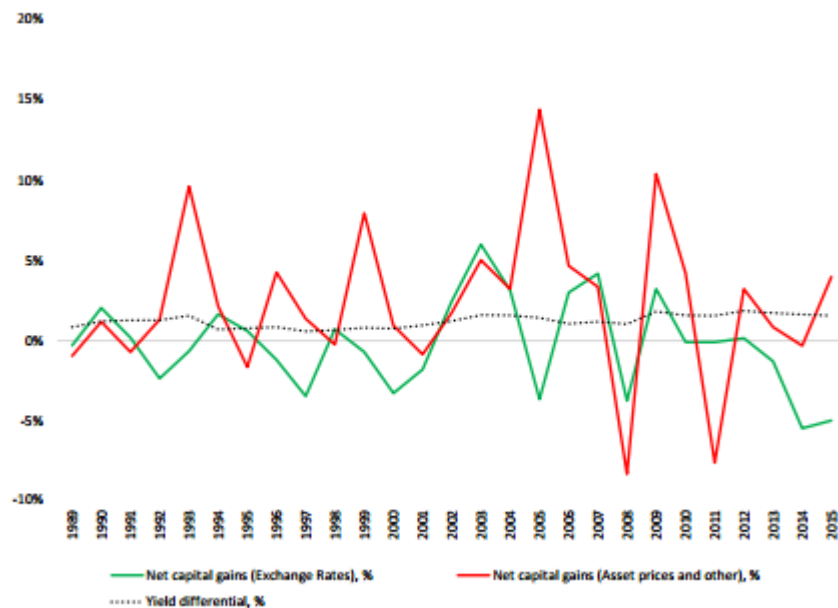


图1 美国资产和负债真实收益和资本收益的差别

我们用第一种方法估计1977-2016年VAR中的变量,用第二种方法估计1989-2015年的。一些相关性比较突出:增长率越低,净出口越高,反映了低产量对进口的影响。不计资本收益的资产和负债的收益率高度相关,当收益率包括资本收益时,相关性较低。

图 2a 显示了资产与负债收益率之差的作用：正的净收益率之差能够大比例的冲销贸易赤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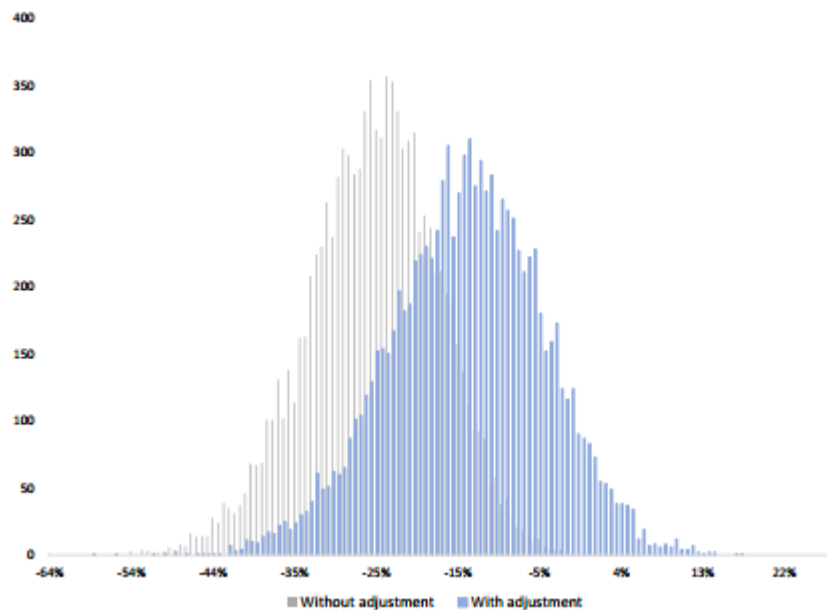


图 2a 包括或不包括资本与负债收益率之差的当前价值

图 2b 显示了资本收益不确定性的作用：当考虑资本收益不确定性时，当前价值的分布更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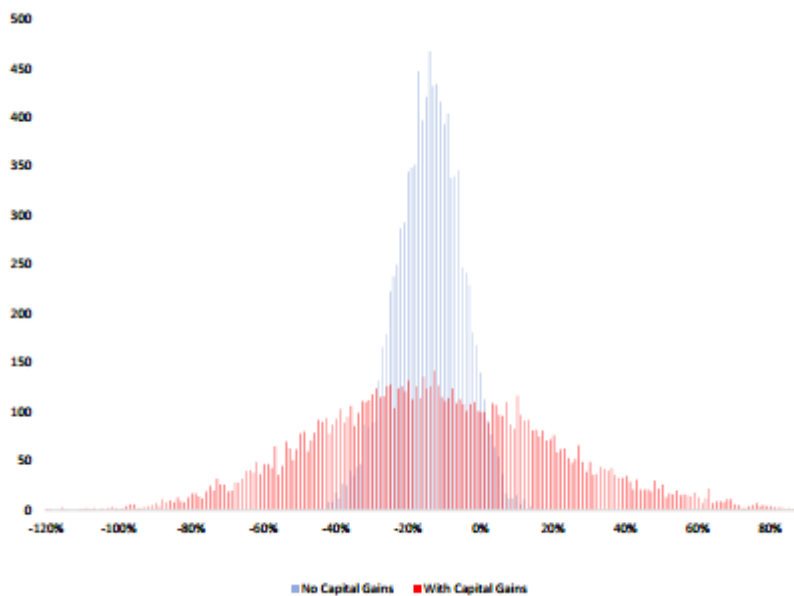


图 2b 包括或不包括资本收益的当前价值

图 3 转向等式 (10) 的左边, 描绘了调整后的包含或不包含资本收益的净债务的分布, 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分布是比较相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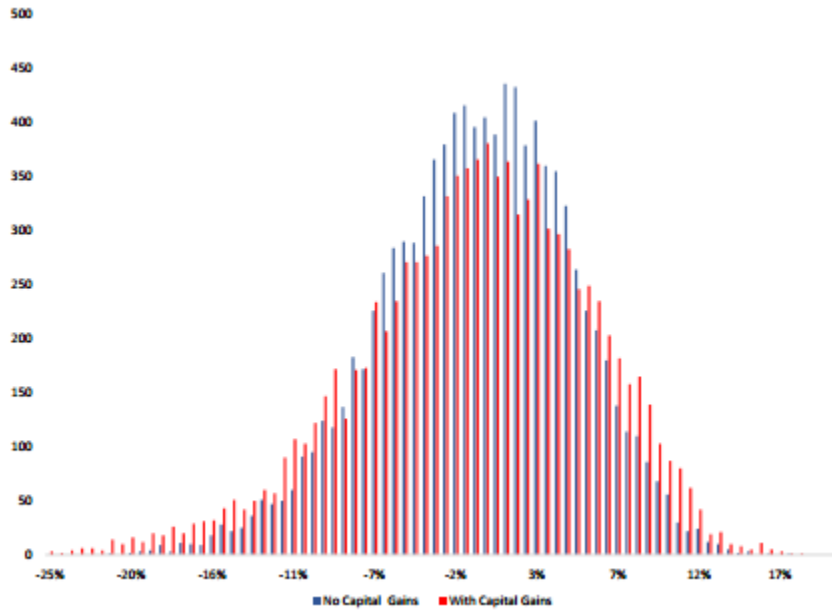


图 3 调整后债务的分布

图 4a 和 4b 把这两部分放在一起分析汇率的影响。若考虑收益率差异, 分布向右移动, 意味着汇率下降的幅度小; 若考虑资本收益, 债务的分布变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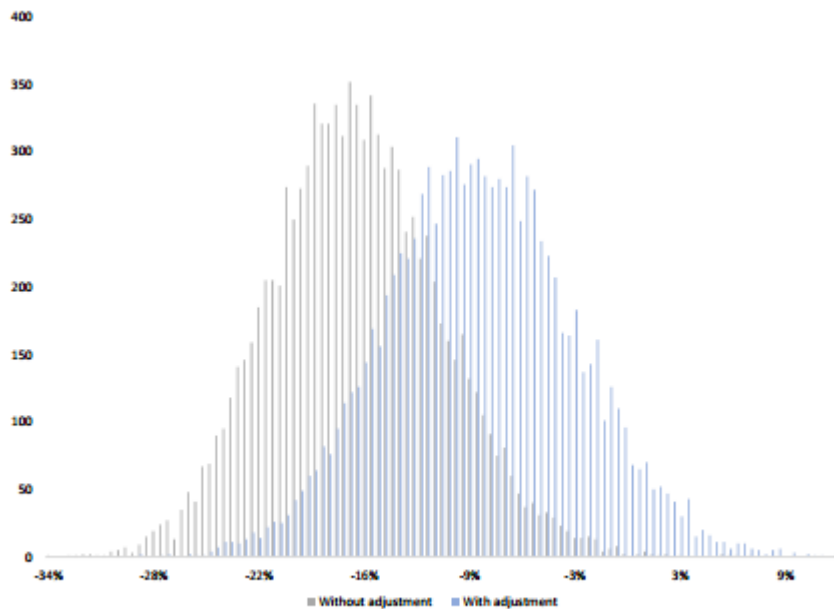


图 4a 包括或不包括收益率之差的调整后汇率的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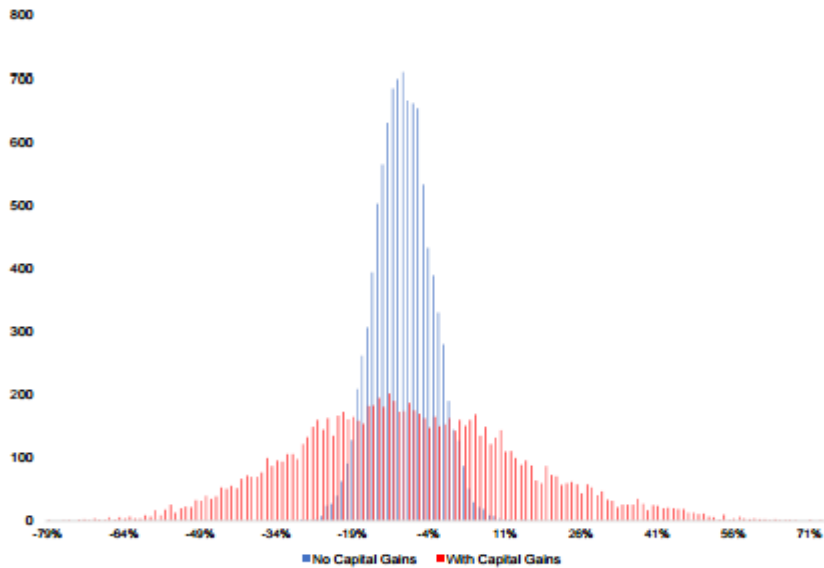


图 4b 包括或不包括资本收益的调整后汇率的分布

综上，我们已经展示了如何使用美国数据构建的可持续性指数。我们的结论是，从截至 2017 年初的美国经济看，假设预测是确定的，维持债务可持续性所需的平均汇率贬值约为 8.3%。当前汇率下债务实际可持续的可能性相当高，在我们的计算中相当于 36%。

6、智利的应用

现在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看一下新兴市场国家的情况，以智利为例。

表 3 智利：数据和预测，2016–2022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净债务/GDP	20%	21%	22%	23%	24%	25%	25%
资产/GDP	134%	139%	140%	141%	142%	143%	142%
负债/GDP	154%	159%	162%	164%	166%	167%	167%
净出口/GDP		2.4%	2.2%	2.1%	2.0%	1.9%	1.9%
实际 GDP 增长		1.7%	2.3%	2.7%	2.9%	3.1%	3.2%
实际资产收益率		1.1%	1.0%	0.9%	0.8%	0.6%	0.5%
实际负债收益率		3.4%	3.3%	3.2%	3.2%	3.1%	3.0%

表 3 为 2016–2022 年智利的数据及预测值。将第六节的分析过程应用在智利。

我们从这次智利考察中得出两个结论，与为美国获得的结果相平行：首先，仅仅考虑贸易平衡可能具有误导性，必须考虑回报率的差异。就智利而言，与美国的情况相反，负面的收益率差异会对所需的汇率调整产生更负面的影响。其次，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是，与实际收益率相关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所需汇率调整是非常大。在不考虑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债务在当前汇率下是不可持续的，汇率下调的可能性可能远低于 1。就智利而言，虽然基准数字表明需要（小额）贬值，但汇率必须贬值的概率只有 49%。

7、评价与结论

本文主要有两个贡献。

首先是方法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债务可持续性指标，即债务在当前汇率下的可持续发展的概率。在确定这个概率时，考虑了资产和负债的收益率差异以及不确定性的影响。



图5 总负债等于净负债假定下美国事实与反事实的调整后的汇率分布

其次是经验。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事实就是总负债和资产头寸的大小与净债务头寸相关。资产和负债的回报率差别很大，意味着债务是否可持续是不确定的。考虑一个反事实例证：我们假设美国的总负债占 GDP 的 44%，总资产等于零，所以净债务为 44%。汇率调整的反事实分布由绿色表示（见图 5），重复的实际分布用红色表示。这显示了从反事实到实际汇率的急剧增加，这种差异是由总头寸与净头寸之差引起的。在反事实分布中，汇率必须贬值的概率接近 100%。我们的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债务可持续性更多依赖于对资本账户的冲击，而不是经常账户的冲击。相比之下，智利的资产与 GDP 的比率接近 150%，一个 5.3% 的资产回报率的标准差冲击将减少债务占 GDP 的 8%，压倒性的贸易差额可能会

出现大幅波动。换句话说，为调整贸易平衡所采取的措施可能只是将概率略微调整一下，任何贸易差额的调整都可以很容易地被总资产和负债的资本收益或损失所抵消。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应该忽略贸易逆差，但是他们应该意识到，贸易平衡的调整能会被资本账户冲击所冲销。

本文原题为“A new index of external debt sustainability”。本文作者 Olivier Blanchard 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 C. Fred Bergsten 高级研究员和麻省理工学院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经济学荣誉教授。 Mitali Das 为 IMF 研究部副部长。本文于 2017 年 11 月刊于 PIIE。[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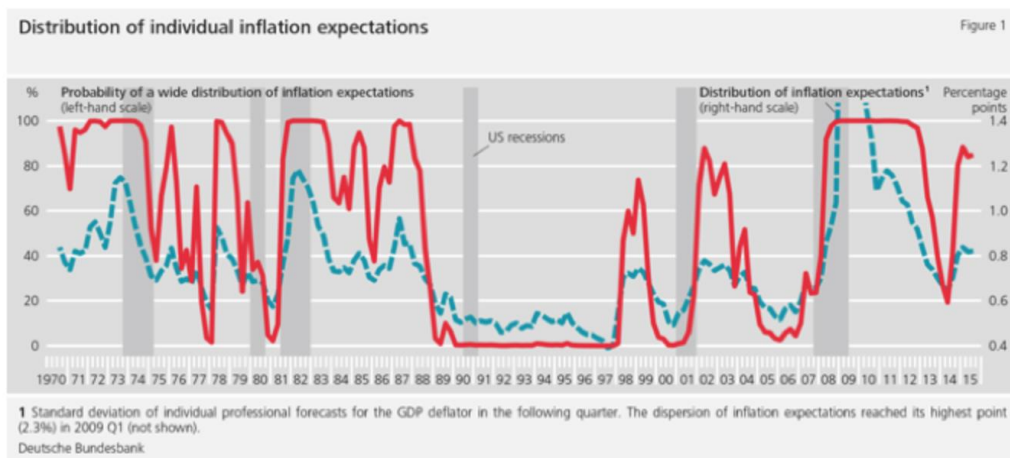
预期差异与货币政策的传导

Elisabeth Falck, Mathias Hoffmann, Patrick Hürtgen / 文 安婧宜 / 编译

导读：现有理论和实证研究认为保守的货币政策会降低通胀和通胀预期。本专栏认为通胀预期的异质性会影响这一关系。结果表明，政策利率可能会在短期导致更高的通胀与通胀预期。这些研究结果也表明了央行在进行经济决策的时候需要关注通胀预测的异质性情况。编译如下：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中央银行上调利率会抑制总需求和通货膨胀，因为人们会倾向于储蓄，从而导致公司降低商品价格。这一理论假定，所有公司都会对经济冲击有充分的认识。而新的研究表明，如果公司的信息不足，一种新的传导渠道就会产生，而中央银行也会有所反应。在这种情况下，私有经济可能会利用关于中央银行的利率信息指导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比如，公司可能会认为非预期的利率上升是需求增长的信号，从而提高商品价格，这样反而会导致短期的通货膨胀和通胀预期上升。这种信号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公司对于信息的掌握程度，这也反映了通货膨胀预期的异质性。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individual inflation expecta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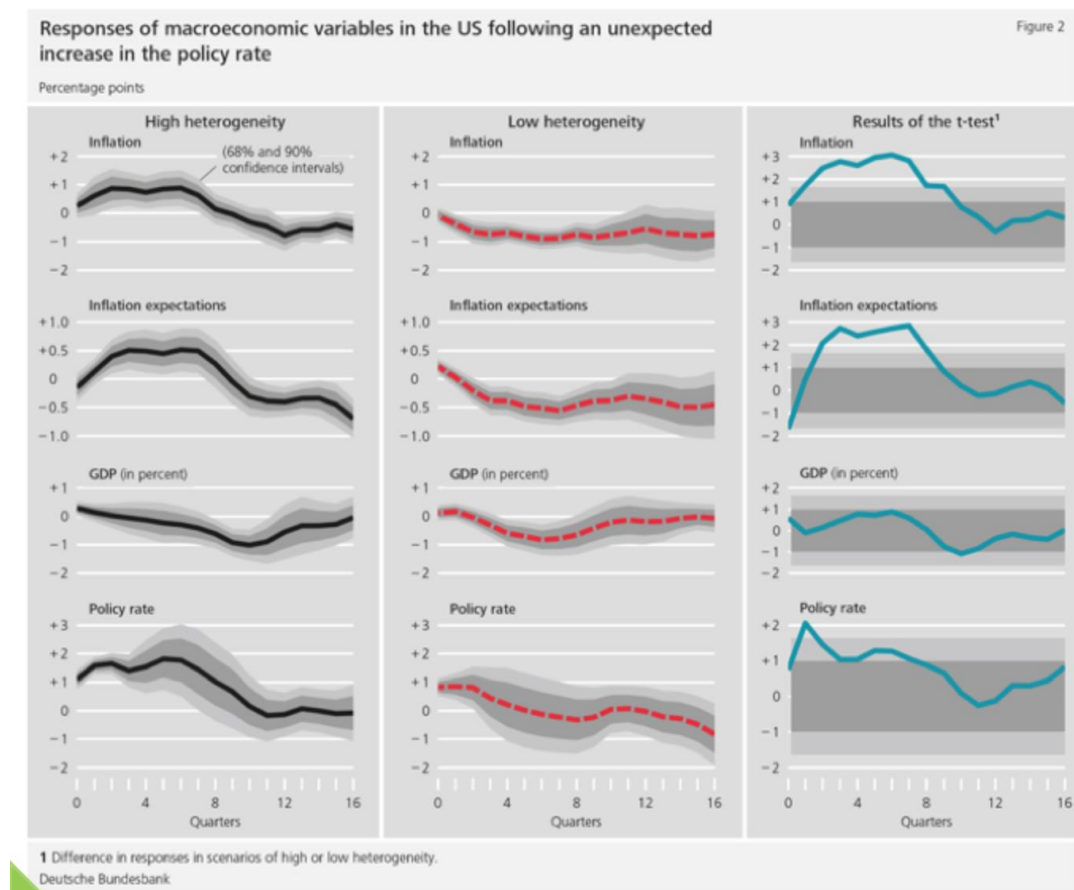
在近期研究中，我们使用了实证方法来检验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对宏观经济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专业通胀预测的异质性。这一方法使得我们可以辨别上文提到过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这一机制会对通货膨胀和通胀预期产生相反的效果。我们计算了专业预测调查中的个体通胀预测区间。这一调查收集了美国 1968 年来的通胀预期数据。图 1 中的虚线表明了 1971-2015 年来通胀预期的区间。为了检验通胀预期的同质性对宏观货币政策的影响，我们使用了一个可以鉴别不同程度的通胀预期方差的实证模型。图 1 中的实线显示的通胀预期与其它预测截然不同。我们可以在整体上估计通货膨胀和其它宏观变量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尽管预期的差别有大有小。

货币政策的影响取决于通货预期的异质性

我们的实证研究表明，通货膨胀和通货预期对于非预期利率上调的反应是不同的，这取决于同一时期解读冲击异质性的专业通胀预测。我们的研究发现，当专业预测具有异质性时，美联储利率上调 1 个百分点会导致短期通胀上升 1 个百分点，短期通货预期上升 0.5 个百分点。当通胀预测的异质性较低时，非预期政策利率则会导致短期通胀和通胀预期向相反方向调整——它们分别会下降 1 和 0.5 个百分点。从图 2 第二列可以看出，这一显著区别在前两年同样适用。

GDP 和政策利率也会对货币政策产生不同影响。无论通胀预期是否一致，GDP 都会下滑。若通胀预测异质性较强，经济产出的下滑就会更加剧烈。政策利率不仅受到非预期货币冲击的影响，也收到外部因素，如通货膨胀的影响。高通胀会使得中央银行进一步上调政策利率。而专家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异质性则会使得这一影响更加显著。

Figure 2 Responses of US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following an unexpected policy rate increa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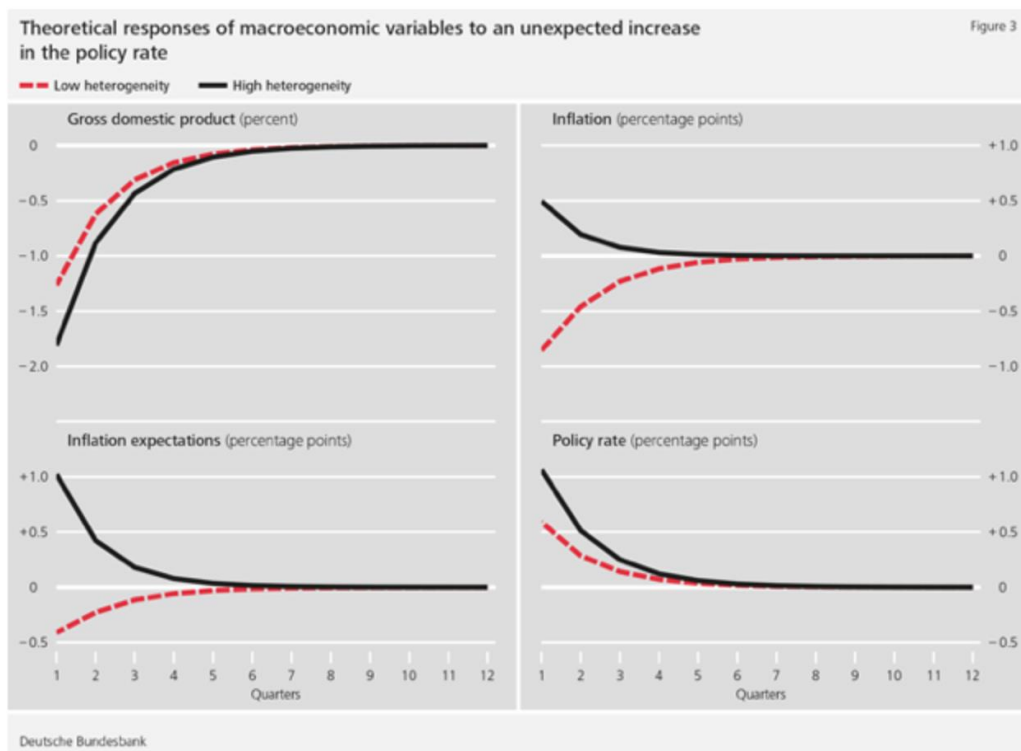
实证研究相关理论

我们的实证研究成果与承认通货预期差异的理论一致。根据 Melosi 的研究成果，我们适用新凯恩斯主义平衡模型。为了解释个体通胀预期的差异，我们假

设制定价格的公司拥有不同的信息，所以它们的通胀预期也不同。这也是公司对央行政策利率高度关注的原因，它们可以借此来了解经济情况。这种影响在公司信息不同的时候则更加显著。

图 3 以两种不同方式展现了货币政策冲击对政策利率的影响，一种假定通胀预期有弱异质性，另一种则假定强异质性。根据此模型，结果会受传统经济渠道和信号效用两个经济渠道的影响。如果政策利率上升，通胀和产出会因为经济渠道而下降，因为人们对储蓄增加，支出减少。这与弱异质性的预测结果一致。如果通胀预期具有强异质性，关于经济情况的不同信息就会导致公司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解读政策利率的变化。它们会认为这是中央银行针对低生产率和高需求做出的调整，而这一情况会增加公司边际成本和价格压力。公司会因此提高价格，而通胀和通胀预期就会暂时上升，直到货币政策冲击的目标变得清晰起来。因此，在此情况下，信号作用就会暂时超过利率渠道的作用。这与我们的实证结论相一致。

Figure 3 Theoretical responses to an unexpected policy rate increase



结论

尽管许多中央银行采取非传统货币政策，准确理解政策利率变化还是有必要的。在美联储开始推行货币正常化和提高政策目标利率区间的时候这一点尤为重要。其它中央银行可能会跟随美联储的决定。我们提供了理论和实证研究，证明

在专家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利率提高可能在短期带来更高的通货膨胀和通胀预期。因此，中央银行应该关注个体通胀预测的异质性，并据此来制定货币政策。

本文原题为“[How disagreement in inflation expectations can influence the transmission of monetary policy](#)”。本文作者 Elisabeth Falck, Mathias Hoffmann, Patrick Hürtgen 是 VOX 资深研究员。原文于 2017 年 11 月发表在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在津巴布韦的影响力

Alex Vines /文 史明睿/编译

导读：几天前，津巴布韦军方从前总统穆加贝手中接管政权。中国与津巴布韦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关系，中国与英国在津巴布韦有着一致的利益诉求，都希望津巴布韦政治和经济局势稳定，投资环境改善。编译如下：

就在津巴布韦军方接管政权的前几天，Constantino Chiwenga 将军访问中国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中国方面在密切关注着津巴布韦事态发展，但没有就总统罗伯特·穆加贝离职这一事件进行任何谴责。

中国是津巴布韦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投资来源，其中从农业到建筑等各个领域的投资额都高达数十亿英镑。津巴布韦经济上非常依赖中国，中国为其出口提供了最大的市场，并为其脆弱的经济提供了急需的支持。

罗得西亚布什战争期间，中国就与津巴布韦保持良好关系。Robert Mugabe 未能在 1979 年得到苏联的支持，所以转向中国，中国为他的游击队提供武器，并帮助他们训练。1980 年津巴布韦独立，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次年穆加贝以总理的身份访问北京。从那时起，穆加贝就成为了来访中国的常客。

多年来，津巴布韦的官员们试图亲近中国以对抗欧美地区，主张国家“向东看”的策略，特别是在 2002 欧盟对津巴布韦制裁之后。事实上，在十年前，穆加贝就曾在哈拉雷的国家体育馆里讲过：“我们已经面向东方，那里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我们背向西方，那里是日落之地。”

在津巴布韦“向东看”的时代，中国与津巴布韦的军事交流也加深了。津巴布韦从中国进行重要的采购，包括洪都 JL-8 教练机，JF-17 枭龙战斗机、车辆、雷达、武器。然而，自 2008 年武器装船争议以来，中国政府决定将津巴布韦列为“限制”军事交易国家。

尽管津巴布韦做出了努力，但“向东看”战略并没有带来投资潮，十年后的 2015 年 8 月，穆加贝公开要求西方国家重新参与他的“国情”演说。

现在的现实情况是，越来越多的中、西方利益（特别是中国与英国的利益）已经趋于一致。津巴布韦最大的使馆中有两个，分别是英国和中国大使馆，两个使馆在哈拉雷郊区相距不远。随着其他使馆缩小规模或关闭，中国的使馆在不断扩大。英国的外交官员与津巴布韦商界、民间社会和反对派人物有着密切的联系，与此同时，中国人也为 Zanu-PF 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党）投入了包括国家安全和总统职位在内的“技术支持”。中国外交官员与 Zanu-PF 党成员谈到中国的政治和宗派问题时，他们之间有着良好的联系和深刻的见解，中国外交官和他们的西方同事一样，关心政局稳定、更好的投资环境和坚持依法治国。

习近平主席于 2015 年访问了津巴布韦，穆加贝总统于 2017 年 1 月访问了北京。中国领导人在公开场合表示，他的国家愿意鼓励有能力的公司在津巴布韦投资。但是私下里，有消息认为，直到津巴布韦经济稳定后，才会有更多的贷款进入。

2016 年，两国贸易额达 11 亿美元，其中中国是津巴布韦最大的烟草买家，同时也进口棉花和各种矿产品。相应的，津巴布韦进口电子产品、服装和其他成品。中国国家建筑公司也在津巴布韦积极建设价值 1 亿美元的国防学院等基础设施。去年，中国同意为哈拉雷新议会提供资金，新的议会共有 650 个议席。

中国的外交官和许多企业家正在等待津巴布韦迎来更好的日子。一些公司已经发现津巴布韦的投资环境具有挑战性，例如曾出现过投资钻石受损的情况，他们已经在寻找替代市场。几个星期前，我在中国，参加中非关系的会议，津巴布韦也没有被提及。津巴布韦不像埃塞俄比亚、苏丹、安哥拉那样是中国的战略伙伴，也不像尼日利亚、肯尼亚和南非那样拥有较大的国内市场，津巴布韦远非中国在非合作的首要任务。

因此，中国的兴趣在于津巴布韦是否有更好的投资环境。一个明确的过渡安排，哈拉雷合法政府的成功选举，这些符合北京方面的利益，也符合伦敦方面的利益。

“向东看”和“重新接触西方”战略并没有给津巴布韦带来所需的信心和投资。津巴布韦需要的是稳定且负责任的政府，在此之后来自亚洲、美国和欧洲的投资者才会认真考虑津巴布韦的投资前景。这是穆加贝一月在北京收到的信息，上周访华的津巴布韦军事长官也被传达了同样的信息。

（本文最早载于 BBC 新闻）

本文原题为“[How influential is China in Zimbabwe?](#)”。本文作者 Alex Vines 是 Chatham House 区域研究和国际法研究室主任，非洲项目负责人。本文于 2017 年 11 月刊于 Chatham Hous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穆加贝的倒台给非洲领导人敲响了警钟

Alex Vines / 文 丁丽伟 / 编译

导读：11月21日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宣布辞职之后，非洲仍是世界上长期执政领导人最多的地区之一，目前有13个国家的领导人执政多年，而且年龄均已超过65岁。本作者认为，穆加贝的倒台意味着非洲大陆上的长期执政者将面临更大的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因为非洲人口日益年轻化，民众与本国的高龄领导人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未来几年，预计将有不同模式的权力交接在非洲不断上演。编译如下：

随着周五姆南加古瓦在哈拉雷宣誓就职，穆加贝作为津巴布韦总统生涯的结束正被整个非洲密切关注，尤其是那些长期执政的领导人们。

目前30%的非洲国家正在被长期执政的统治者统治着，以超过10年担任国家首脑来界定。在这方面非洲并非独一无二的（中亚地区也有高龄领导人），但是非洲有一个长期的传统，自独立后五分之一的非洲国家领导可以被列为长期执政者。

供职在EUISS（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of Security Studies）的作者在最近一项研究“非洲未来：展望2025”显示，非洲的长期执政领导人的数量在减少。安哥拉总统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在执政将近38年后在九月份自动下台，2017年初冈比亚的叶海亚·贾梅在执政23年后被赶下台。罗伯特·穆加贝本周早些时候在执政37年后被军队驱逐。仍然有很多其他高龄领导人：赤道几内亚特奥多罗·奥比昂·恩圭马·姆巴索戈（38年）；喀麦隆保罗·比亚（35年）；乌干达约韦里·穆塞韦尼（31年）；苏丹奥马尔·巴希尔（28年）；以及其他八个领导人。

他们很多人正在承受来自内部的压力。在夏天多哥的福雷·纳辛贝在洛美被迫同意未来任何总统最多任期两届。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执政16年后，约瑟夫·卡比拉也被施压同意选举。

在这一切之中，在西部和南部非洲领导人的模式中，仅任期两届是被接纳的原则。

实际君主国

在中部非洲和大湖区，长期执政领导人依旧长青。这些地方的总统们成功地修宪以继续执政。他们有刚果共和国的德尼·萨苏-恩格索和乌干达的约韦

里·穆塞韦尼。津巴布韦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警告：他们不该妄想他们能够像实际君主国一样行动，只有自然死亡后才交出政权并把权力传给他们的家族。

罗比特·穆加贝有意把权力传给他妻子格蕾丝·穆加贝，但却事与愿违。正如一些津巴布韦军官冷淡的评论：“领导岗位不能夫妻相传。”埃及前总统胡尼斯·穆巴拉克也在培养其子的过程中出现了误判；尽管阿里·邦戈·翁丁巴在他父亲死后继承了加蓬总统的位置。总统昂比奥正在试图培养他非常不受欢迎的浪荡子特奥多林继承大统，这让赤道几内亚国家也因此面临危机。

津巴布韦的事件提醒我们，除了中部非洲之外，未来十年将有越来越多长期执政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在政治舞台上消失。部分因为压力，部分由于年龄：目前的 13 位长期执政领导人年龄分布于 65 到 84 岁之间。这意味着将发生更多的权力交接，形式要么如周五的津巴布韦，要么如九月安哥拉的平稳过渡——总统多斯桑托斯卸任同时把权力交给了若昂·洛伦索。

对于非洲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年轻的、人口增长最快的大陆而言，这是好消息。非洲在面积和人口两方面都是世界第二大洲。超过 40% 的非洲人小于 15 岁，20% 的人口介于 15 和 24 岁之间。到 2050 年，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年轻人口将居住于非洲，而 2012 年这一数字是五分之一。这意味着长期执政的领导人和民众之间的隔阂会不断加深。

在过去一周的津巴布韦，可以看到显著的代际政治，并且最终较老的一代人通过军事干预取得胜利。这是一种过渡政治，而且会越来越多地出现。

不断增长的压力

其他长期执政的领导人，如乌干达的穆塞韦尼已经有所警觉。穆塞韦尼已通过大幅提升军队待遇来加强其对自己的支持。未来几个月，非洲长期执政的领导人可能投入更多资金用于军队。

在非洲，改变总是断断续续到来。穆加贝的倒台提醒人们，非洲是有活力的并且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在不断增长的压力下，非洲的长期执政者们将最终得证明其社会价值。有些人会采取更加高压的政策，而另一些则会得出结论：他们的时代已经结束而且他们应当迎接过渡。

这就是安哥拉带来的关键一课——该国总统多斯·桑托斯在当权 37 年后自愿退休。穆加贝梦想着自己在办公室里终老，传位于他妻子，但被军队逼迫下台。我预计将来几年两种模式都将会非洲大地上不断重演。

本文原题为“Mugabe’s fall is a wake-up call for Africa’s leaders”。本文作者为查塔姆社 (Chatham House) 的非洲项目负责人 Alex Vines。本文刊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 Chatham Hous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想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把印度纳入 APEC

Alyssa Ayres /文 丁丽伟/编译

导读：11月10日，唐纳德·J·特朗普总统在越南岘港发表了讲话，描绘了其政府在亚洲的战略，其中重点强调了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本作者认为，让印度加入 APEC 所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潜在的代价，且印度之于 APEC 比 APEC 之于印度的意义更大。同时，将印度打造成民主和繁荣的亚洲中一个重要的利益攸关方的战略是可敬的，但是缺少经济的压阵，其也终将功亏一篑。编译如下：

唐纳德·J·特朗普总统刚刚在越南岘港发表了讲话，描绘了其政府在亚洲的战略，其中重点强调了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他应该从支持印度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开始。

印度是第三大经济体，尽管追述到 20 多年前它就提出申请加入 APEC，但是却一直被这个重要的组织拒之门外。印度加入 APEC 可以帮助抵消现在势不可挡的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同时也可以促使印度进一步地经济改革。这也向该地区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即增加自由开放的贸易，这样的时刻特朗普政府急需发出一个这样的信号。最后，支持印度加入 APEC 将表明美国承诺帮助作为战略合作伙伴的印度在全球治理机构中获得更重要的角色。

特朗普在岘港的演讲建立在亚洲行之前来自他内阁的信息。在总统访问之前的几个星期里，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和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都在备受关注的声明和讲话中使用了“自由开放的印太”一词，强调印度与亚太地区的地理联系是特朗普政府战略考量的基石。然而华盛顿将如何明确地帮助实现这一概念还没有具体化。

纠正印度被排斥在该地区最大的经济组织之外是一个很自然的措施，尤其是自从 2010 年 APEC 中止纳入新成员到期后，新德里仍然在这方面受到冷遇。奥巴马政府从来没有超越“欢迎印度有兴趣加入 APEC”这一模糊立场。它既没有保证明确地支持印度加入该组织，也没有花费外交资源来帮助其实现这一目标。

这些对印度加入 APEC 的冷漠也是由于新德里在贸易谈判中毫不妥协的坏名声。他们担心印度会使这个成功的组织运作混乱。但是 APEC 并不是一个有约束力的议事论坛，它通过对话和行动计划来共同地推进地区的“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让印度加入 APEC 的好处远远大于潜在的代价。

伴随着特朗普政府决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华盛顿在亚洲的经济影响力衰减；同时，以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标志，中国在亚洲的贸易和投资联结却在不断加强。通过把印度，这个世界第七大经济体拉进 APEC，华盛顿可以帮助更广阔的“印太”区域更好地平衡它的经济重心。与此同时，把印度纳入这个致力于自由开放贸易的非约束国际组织将提供给印度改革派其所需的外部证据，用于解释为何改革将让印度经济走得更远。

同样重要的，当亚洲盟国和伙伴都对华盛顿究竟如何对待自由开放贸易感到疑惑时——退出 TPP 之后，特朗普政府正在北美自贸协议（NAFTA）和美韩自贸协议问题上与加拿大、墨西哥和韩国龃龉不断——通过推动印度加入来展示特朗普政府对于 APEC 机制的支持，可以再次确认美国支持贸易的态度。APEC 机制有助于设置全球议程，而且亚洲地区也可以利用这一美国支持自由和开放贸易的信号来阻止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

最后，如果特朗普总统支持印度加入 APEC，将展现出华盛顿认识到把印度拒之门外是不公平的，尤其是自 APEC1989 年成立以来印度经济显著增长。如今，印度经济规模超过了七国集团中的加拿大和意大利。即便印度经济如今已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力量，从制度和经济两方面看，继续缺席亚洲最重要的经济组织对新德里来说毫无意义。另外，美国的支持也体现了其帮助印度获取更核心的全球领导地位的承诺，而这正是印度所寻求的。

在美国总统为打造更现实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所能采取的所有步骤中，无条件地支持印度获取 APEC 成员资格将是最显而易见的一步。尽管在 APEC 峰会上支持印度加入的机会本身意义重大，特朗普政府也仍有机会在未来几个月中安排这一步。让我们期待他们尽早决定采取这一行动。没有经济作为压舱石，本届政府可敬的战略目标——将印度打造成民主和繁荣的亚洲中一个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将功亏一篑。

本文原题为“Want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Get India into APEC”。本文作者为 CFR 印度、巴基斯坦和南亚的高级研究员 Alyssa Ayres。本文刊于 2017 年 11 月 13 日 CFR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1920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2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外交关系协会

简介：成立于1921年，是美国非政府性的研究机构，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CFR是一个由精英学者组成的组织，成立伊始就成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曾为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谋划策。该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杂志曾刊登过乔治·凯南、基辛格和斯坦利·霍夫曼等美国知名外交家、国际政治学者的论文。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FR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6名。

网址：<http://www.cfr.org/>

RAND Corporation (RAND) 兰德公司

简介：兰德公司成立于1948年，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在其成立之初主要为美国军方提供调研和情报分析服务。其后，RAND逐步扩展，并为其它政府以及盈利性团体提供服务。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RAND 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6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8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3 名。

网址: <http://www.rand.org/>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 CIGI 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 由 Jim Balsillie 成立于 2001 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 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 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 <http://www.cigionline.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 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 成立于 1981 年, 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 年, 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 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PIIE 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10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4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 名。

网址: <http://www.iie.co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 IMF 于 1945 年 12 月 27 日成立, 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 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 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 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 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 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 <http://www.imf.org/>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 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 成立于 1977 年, 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 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 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 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加图研究所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14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3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8 名。

网址: <http://www.cato.org/>